

王补宣先生家的“文物”

波波

我父亲作为老一辈“海归”，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有一点不入时尚。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学美国，1949年就匆匆忙忙赶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那一拨人。小时候，总看见他坐在书桌前写东西，有时候他会停下来拉两下计算尺，然后再接着写。那时候还没有计算器，比起算盘来，计算尺就显得挺“洋”的了。

在我眼里，我们家从生活方式到用具摆设，都没什么“洋”的，比较简易凑合的样子，好像总是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儿得等着做，这些对付对付就行了。所以我后来经常调侃说，我们家，怎么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呢？

家里不多的洋货里，有一台电唱机和不少唱片。我爸爸这个人很古板，虽然他对人很和气，但是他不愿跟人分享的东西，是不会随便拿出来的。他不训人，也从来没有打过我，生气了顶多就是不理人。但是他板着脸不讲话还是挺可怕的，家里的气氛会变得很紧张。他一不讲话，你就闹不清怎么了。要是一连几天这么沉闷，大家就更难受了。所以他不给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也不会闹着跟他要。印象里我只见过这台唱机两次，都是大舅妈从上海来玩儿的时候。她是德国人，嫁到中国以后，在四川待了很长时间，讲中文带四川官话口音，喜欢在我们楼后面的树林里散步。爸爸拿出了我从来没见过的唱机，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听音乐。我跑去看热闹，大舅妈用手指放在噘起的嘴前，示意我不要出声音。我发现这个唱机很有趣，放唱片的时候不是听完一面再翻过来的那一种，而是将一套片子一起放上去，等到唱针走完一面到了中心的时候，会自动抬起来，然后有一个装置从下边往上一顶，最上边的一张就滑到旁边，唱针又落回来放下一张唱片。所有A面听完以后再全翻过来听B面。家里有这么一个好玩的东西，却从来没见爸爸用过。他们静静地坐在这架机器旁边听音乐，就像去音乐厅听人演奏那么严肃。望着那精致的机械一圈一圈地在

这布满神秘纹路的唱片上划过，我在想：
爸爸还藏着什么好东西，没给我看？

搞不懂爸爸为什么那么谨慎，其实他把唱机开在那里，成天放着古典音乐，像背景声那样熏我们，也不会怎么着。对于我们这些屁孩子，好玩的事情多着呢——粘蜻蜓，捉唧鸟，打绷枪仗，夏天游泳，冬天划冰车，才不会为了这点儿看不见摸不着的声音走火入魔的。古典音乐这点儿修养别说影响，就是你强迫孩子下苦功学，也未必能学出个样来。东西买了不用，还不如没有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没等人家来抄家，爸爸那些唱片就被自行处理了。

看到和洋唱片一起清出来的，还有一盒子一盒子的京剧唱片，才知道原来爸爸的这些东西，全是给爷爷娱乐用的，听说爷爷在世时爱听戏。爷爷在我没出生以前就去世了，估计有的东西，压在箱子底下就一直没人动过。我对那些百代胜利的老唱片不感兴趣，稀奇的玩艺儿有的是，旧衣服、旧首饰，还有面额大得吓人的旧钞票。外婆结婚时候的一对大炮仗让我们激动了好半天，像小擀面杖那么大个儿，真想点燃了听听响，犹豫了多少次，还是没敢。够乱的了，万一炸出点事来可不好。

别人家抄出来的东西可就厉害了，清华里办了一个“抄家展览”，有国民党青天白日旗、日本军刀、北洋军服、大清朝服、地契、委任状、书信，像金银首饰、唱片、香水什么的表示封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东西，都没人要看。要是这个展览能保存下来该多好，那就是一个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博物馆。

如果说所有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都有后代在清华，可能不太准确；但要我举出几个有头有脸的例子来，却是轻而易举。像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冯玉祥、段祺瑞……等等，这些人的后代有的我只是知道，有的远远望见，有



父亲王补宣20世纪40年代的照片。

的则是天天在一起。著名史学家钱穆的孙子住在我们这个单元五层，当时还在上小学，他用绷弓子打季鸟（知了）经常是弹无虚发。有一天我们在楼前边玩，另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孩子对他说：你知道吗，你爷爷是毛选里边点名的大反动派！虽然说童言无忌，多少反映了家长有意无意对孩子的影响。别说当时不上学也没书看，就是现在报纸上书店里到处都能见着国学大师钱穆，你问问有几个小学生知道钱穆是谁？不过残忍而又荒诞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，我们照样玩。二楼的朱婆婆天天怕我们把楼前的一株玫瑰弄死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是朱自清先生活着的时候同她一起种的。前朝旧人存一点物什留点念想，已然是挺凄凉的事情，但以当时阶级斗争的观点，这些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企图推翻政权的证明。清华这地方俗语称为：物宝天华，人杰地灵；用大批判语却叫做：庙小神灵大，池浅王八多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那一段，我爸爸还没受什么罪。亲眼见到的仅仅是他们系里十几个年轻教师和实验员来我家，其中一位是新年联欢晚会带着我玩的。我跑上去叫他，他却没有理我，当时有点不知所措。他们在我家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，写着“王补宣，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”。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，对这些时髦的词似懂非懂，但起码知道不是什么好事。

真的让我大吃一惊的，是我们家的另一件洋货：收音机。

这个收音机是我爸爸从美国带回来的，样子很难看。因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用的，铁皮的外壳是橄榄绿颜色，侧面用白漆写着“P. H. Wang”，爸爸英文名字的旧式缩写。不像别人家外壳是木头的那种，没有漂亮的胶木旋钮，光光溜溜，什么装饰感全没有。爸爸说这种军用收音机质量好，灵敏度高，能收短波，过去不拆附件装置的时候还能当收发报机用，还强调说回国进海关的时候填了正式申报单子的。从我记事起，这东西就放在玻璃橱上边，平常就像家里那条美军毛毯一样，不是什么秘密，天天用。那条黄绿色的毯子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理的军用物资，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盖在上边，有的时候拿它垫在下面，除了毯子的角上有那么一块印着US标记，谁还会注意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每天中午我们都听《林海雪原》、《红旗谱》，也许我们用收音机的时间比爸爸还多。这个像鞋盒子大小的铁皮匣子里边一亮，照在收音机的面板上又温暖又柔和，侯宝林和郭启儒的相声，孙敬修老师



20世纪60年代初的全家福。

的故事，还有“小喇叭”令人难忘的清脆号声，成了我们幼时平静的生活里非常美好的回忆。

爸爸的收音机，在1968年年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突然成了一个罪证，有人揭发我家藏着发报机！

本来武斗刚完，该下农村的插队去了，该上学的也复课了，一切都像折腾累了该歇会儿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么一个玩艺儿，怎么能不让人激动呢？谁想得到我爸爸这么一个平时清心寡欲，为人和和善善，除了一门心思读书做学问别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人，原来有发报机！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估计这个消息，曾经教不少人肾上腺素分泌过剩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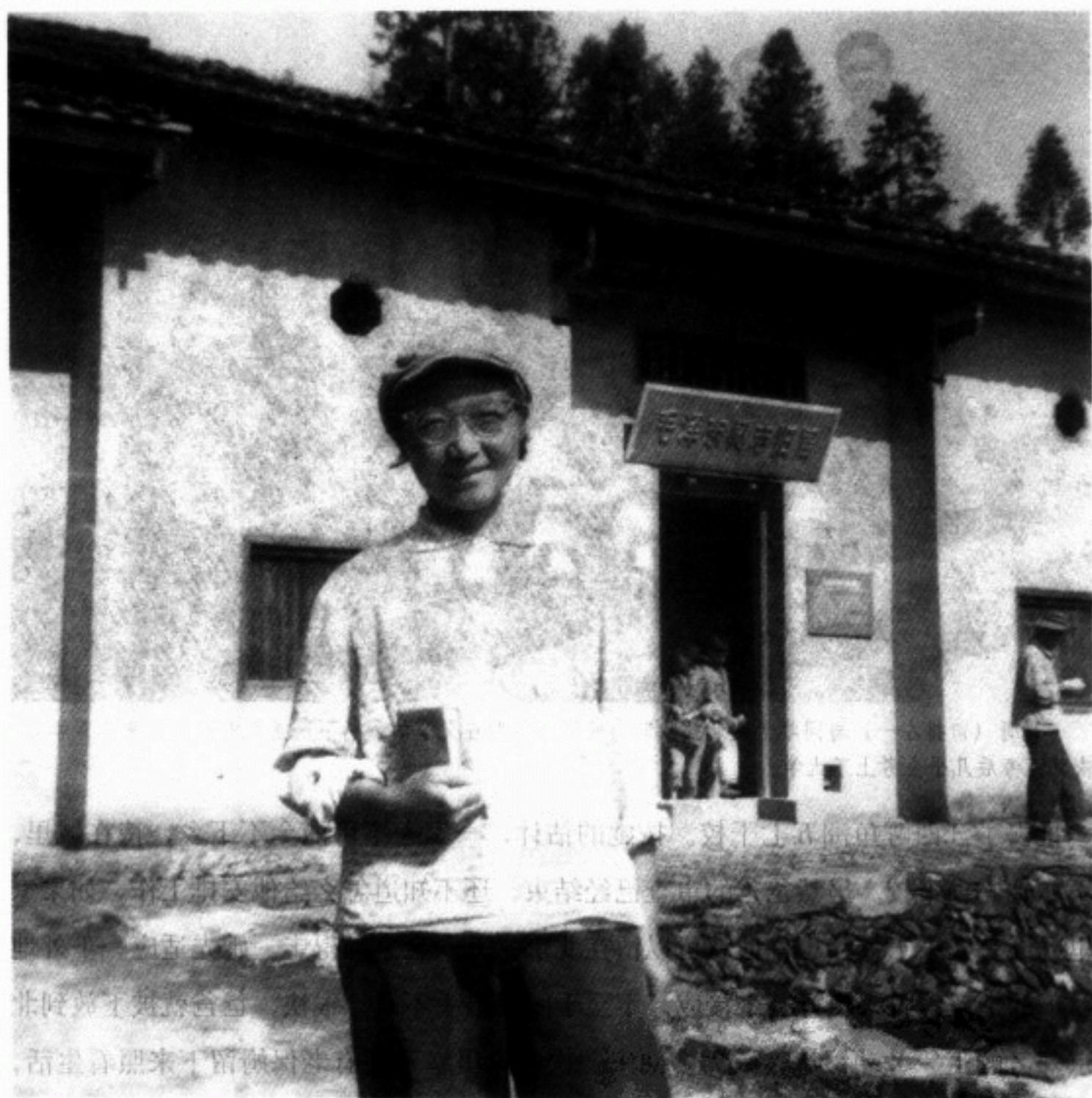
来抄家的那天晚上，气氛特别不一样，屋子里翻得乱七八糟，可是却安静得出奇。所有人都闷着头在那里翻，平时见着面得叫叔叔阿姨的，这会儿谁都不理

我。爸爸的房间突然间大放光明。那间屋子白天都不怎么亮，从阳台缩进来一大截，前边有另一个楼挡着，日照的角度非常小。到了夜里一盏15W的灯泡只够照亮我爸爸坐的地方。“文革”以后房子越调越小，屋里除了床，就剩下一条走道，更显得阴暗。反正那年头我们都不读书，外边热闹，我们几个孩子都爱在外边待着，回家就是吃饭睡觉。自从合住的人家搬进来以后，爸爸老爱关着门，连热天都关着，好像关着门天下就太平了。现在祸从天降，一盏光秃秃没带灯罩的大灯泡吊在屋子中央，不知是我心里的错觉，还是什么人特地为这个不寻常的时刻换了灯泡，看上去足足有100W。

那时候，大批判的语言是非常形象的，常听说：将×××揪出来，将他的反革命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这回我爸爸的乱七八糟东西，真的是被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”了！连20年前妈妈写给爸爸的信也抄出来了，要说不好意思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不好意思的呢？话又说回来，那些抄家的人也很辛苦，找点儿东西哪那么容易，把那些摞在一起的箱子一个个打开，比换季的时候捣腾衣服还累。翻桌子开抽屉也麻烦，写满了字的纸片、信件堆得到处都是，打都打不开。不要说外人，就是主人自己都害怕收拾，更何况这么胡猜瞎琢磨。其实，他们就想找那个听说已经拆掉的收发报装置，只要一发现这个部件，特务的罪名就算坐实了。

我刚上初一，正是好奇心最重的时候。看到家里出了事，又惊讶，又激动，急着要看个究竟。无奈屋里屋外全是人，等了半天最后还是睡着了。他们怎么离开的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，搜出了什么我也不清楚。究竟有没有像“密电码”那样的东西？收音机他们是拿走了，因为很明显，原来的那个地方已经空了，只剩下尘土。

往后的几个月里，爸爸天天受审查。很多次看见他的单位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教师送他回家。也许安排每天送我爸爸回家，是担心玩过了火，闹出什么意外吧？虽然没有专政机关那些有震慑力的仪式，也没有穿制服带行头的出现，天天让人逼着写交代材料的日子，一定很不好过。爸爸很少讲话，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并不好。老实说，比他倒霉的人有的是，起码他每天还可以回家。但这并不等于说问题不够严重，就在那一段时间里，先后有许多人想不开而寻短见的，我们楼就有两个



妈妈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前的留影。这次得以瞻仰伟人故居，是对她在“五七”干校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次褒奖。

教师跳楼自杀。楼后边本来是我们经常玩的地方，玩踢锅电报（捉迷藏）、踩堡、闯关，热闹的时候能聚上几十个小孩玩游戏。现在死了人，谁也不敢去了，到处长着半人高的野草，杨树林子里面小风一吹，就是在晴天，听声音也总像在下雨，阴森森的。据说过了一年还有一块死者的脑浆干在地上。

1969年特别冷清。

哥哥姐姐全插队去了，一个在陕北，一个在内蒙。到了夏天，妈妈主动报名第



哥哥（前排左一）与同学于陕北插队时的照片。他们在父辈的影响下，虽在农村却仍未放弃学业，恢复高考后几乎全考上了大学。

一批去了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。按她的估计，一家人不可能全不下乡，待在城里，不如她先去干校。虽然爸爸的审查已经结束，还不知道怎么给他安排工作，如果家里已经有人去干校，也许他就可以留在北京。万一全家都得走，她先适应一下外地乡下的情况，将来也好有个接应，不至于闹得措手不及。很快，爸爸就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工厂劳动锻炼，一周才回来一次。家里幸亏还有老保姆留下来照看生活，虽然大家各奔东西，北京的这个家总算保住了。我开始一个人睡一间屋，奢侈地躺在爸爸的双人床上，月光下物影分明，屋子里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呼吸声，因为担心半夜起来解手而一遍一遍跑去上厕所，总是为搞不清哪一次才是睡前最后一泡尿而苦恼。

像大多数十来岁的孩子一样，我希望成为社群里受欢迎的一员。在我的生活中，家庭的重要性正在被社会所取代。我渐渐陷入了对现实世界的困惑之中。我的朋友圈子，开始超出同一片楼房居住区的范围，认识了体育学院来的孩子，还有周围农村的学生。我想受表扬，甚至还想加入红卫兵组织。当时的红卫兵已经完全不是



姐姐（前排左二）离京赴内蒙古插队前与朋友们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。

“文革”中造反派组织的意思，实际上相当于过去的少先队共青团，是校方奖励给听话孩子的一种荣誉，只是换了名字而已。连着两批都没有发展我，这本来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。我爱讲话，不专心听讲，尤其是劳动中从来没有过什么突出的表现。直到有一次，平时和我挺好的朋友突然告诉我，他们班的老师不让他和我玩了，说我是特务的儿子。他要想加入红卫兵，应该跟我划清界线。我相信他讲的全是真话，他家在体院，对清华的事不会太了解。看着他一副对不起我的样子，一定事先没想到我的反应会这么剧烈，我的愤怒当然是冲着那个女老师，可是我一急起来，都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了。好像我真的隐瞒了多大的事情不能告诉他似的，可是叫我怎么说呢？我爸爸在美国留过学，我们家有一台难看的美国收音机？要是这么简单，那为什么人家要说你爸是特务呢？有一次放学的路上，一起玩的孩子问我：哎，听说你家有发报机呀？×你妈！我回骂道，你家才有发报机呢！他说，不就是问问嘛，别急啊。我怎能不急呢？突然间觉得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围绕着我，我们家。我都快被吞没了，可是还说不清楚它是什么。

不管怎么说，我也得找那老师讲理去！小孩不懂就算了，她凭什么说我爸是特务？老师讲话总得负责任吧？是的，我爸是到美国留过学，但新中国一成立他不是就回来了吗？要是他不爱国还回来干吗？你诬蔑好人，你别有用心！我心里不停地酝酿着揭穿一场阴谋的斗争，血直朝脑袋上边涌。说我爸是特务，你有证据吗？工宣队、军代表、党组织有结论吗？有的话，你见过吗？拿出来让大家看看？拿不出来你就是造谣！你就不配当老师！连着好几天我都在想怎么找她说。平时我连在班上发个言还心跳半天，这事我就更没把握了。万一她不承认她说的话呢？这么一想，脑袋都快爆炸了。

等到讲话对质的机会来了，事情却和我预想的全都不一样。我看她从教室外边的走廊上过来，正好周围没什么人，我冲到她面前，狠狠地瞪着她，事先想好的那么多话一句也上不来，憋了半天，我说：我爸不是特务！

人家根本没理我。也不知道是我咬字不清还是声音太小。

爸爸的审查一完，他就开始惦记他的那些老同学了。“文革”前没有见他们有那么多来往。他是属于那种典型的书生，耐得住寂寞，能长久专注于他的课题，磨板凳的工夫一等。但经此一难，也坐不住了。受审期间被问及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，爸爸说没有，经过翻来覆去多少回合，总算想到了大学毕业时，班里有一个自发的同学联谊会，叫晔社，取日照清华之意。尽管爸爸的记忆力奇好，无奈当年不曾积极参与，诗文词曲也非所长，加之一生秉守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，每日被强迫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，挖空心思，苦不堪言。原来外调人员从核工业部连培生先生处早已查获一份晔社名单，对爸爸的折磨竟然是为了考验他的态度。意外的收获则是拜回忆和外调材料之赐，爸爸了解到很多老同学的下落。自西南联大兵荒马乱之际，匆匆一别，杳无音信，如今思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。

王积涛先生与爸爸在联大和美国普渡大学有两度同窗之谊，他在美国时是中国同学会会长，虽然专业领域不同，但交情却很不一般。他诗书画无所不能，自幼上教会学校，英文极佳。王积涛待人平和，治学严谨，达观爽朗，与世无争，想不到亦遭人指控，被罩在一个更大的特务网之中，上了报纸，更是一夜成名。爸爸借着到天津出差的机会，跑去南开大学打听老友王积涛的下落，在传达室从门房那里得



爸爸（二排左四）1943年从西南联大毕业时的毕业照，前排为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家刘仙洲、李叔祥等。

知他还在隔离审查。想着爸爸怅然折返的情景，真是凄凉之至。

京津几乎一望之遥，但小的时候从没见他们来往，一般爸爸不找人到家来，更少去登门拜访故旧，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或者是君子不党吧。这个时候他那么想见朋友，一定是内心苦闷难忍。妈妈在干校，哥哥姐姐在农村，我年岁尚幼不入他的眼，总不能有话跟我家保姆说吧？虽然我家的保姆识字懂礼，人很精明，尤其不乏生存的智慧，对我们家也尽心尽力。记得我嫂子第一次来我家玩，看见老保姆手里拿着报纸，在读《参考消息》，吓了她一跳。

渐渐地，来家里看爸爸的人多起来了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总工程师励成豪先生，是爸爸联大同学里来访得比较早的。他说上学的时候和王积涛学自行车，结果王积涛控制不住，撞了一位穿旗袍的太太，没想到此人是警察局长的姨太太。等到王积涛后来到我家，讲了故事的下半截——原来，励成豪说好了教他骑车，帮他扶着一路护驾，可是一闯祸，他溜得最快，一转眼就跑没影了。当时，警察局把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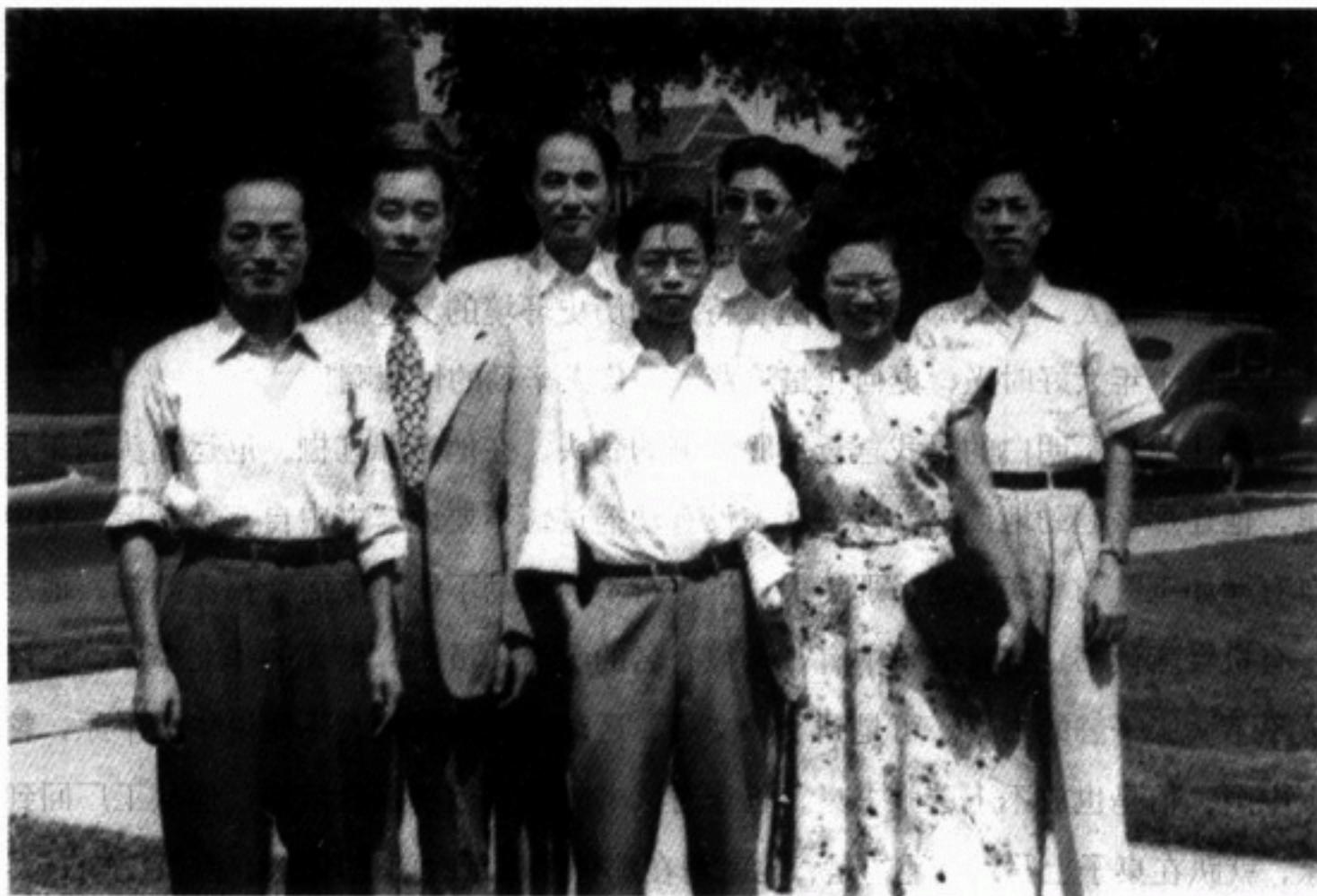
20世纪50年代姐弟三人与老保姆合影，老保姆在我家活到98岁，无疾而终。

外国充当帝国主义间谍特务的罪证。他们万里迢迢选两件工业品带回国，大概如同我们80年代出国人员购买冰箱、彩电一样，选价钱、选品牌皆是一时之时尚，原因都是当时国内的工业产品、经济水平以及商品供应尚不发达，至于日后惹出那么多麻烦，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。现在很难想象，什么人会指着你十几年前买的电器产品，说你是间谍特务。

那位不让她的学生和我玩的老师，后来还跟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过。她其实挺善良的，除了比较爱唠叨，也没什么心机。我总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有的时候人的判断力会这么差？设身处地想一想，谁愿意发展我爸当特务啊？他小的时候因为生病吃奎宁吃多了，造成严重的听力障碍，耳背得厉害，说话要音量很大才听得见。当特务起码要耳聪目明、手脚灵便，我爸首先在体能上就不合格。他连骑自行车都

积涛逮住了。爸爸说励伯伯是跑去找校长杨石先，好把人保释出来。

事情过去那么多年，如今我爸爸过得挺好的，我也还算成长顺利，而且我在美国生活居住的年头，比起爸爸留学和访问的时间加起来还长几倍。回味往事自然多了几分体会。我爸爸20世纪40年代留美时的个人经济状况，不会像我们80年代出国时那么一贫如洗，却也不会如富家子弟那样挥霍，买军用处理的收音机，无非是图个价廉物美。有趣的是，我哥哥的岳父王积涛先生，回国时也带了一台同样的美军收音机，“文革”当中一样成了指责他里通



1948年，在美国普渡大学读书的部分中国同学。

不会，每天走路上下班，像他这样只会读书做学问的人，很难想象他居然过着双重生活，背地里突然手脚麻利得很。他在社交上很有节制，连身边人的是是非非都搞不清楚，到哪儿去收集情报呢？他长期是党外人士，等文件传达到他的耳朵里，大概已是无人不知了。他除了读书做学问，基本上没有剩余的时间用来娱乐或者做什么其他的事情，就连“文革”当中他也一直在读书，很少中断。单位里的同事如果怀疑他私下里干了什么别的，只要把他读的书和记的笔记全拿出来看看，就全明白了。不要说有点成果或者创见，光是把那些东西读一遍，把公式推一推，这点时间没准儿还不够呢。如果批判他白专，还庶几近之，特务？太离谱了。

等我年龄稍长，开始能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。他们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参与者。他们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不是苦大仇深，而是年轻。从肃反、镇反、思想改造、反右、四清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他们从老一辈学者、学长一直斗到“一二九”学潮起家的老革命，学校里的人，都让他们给得罪遍了。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，上有恢复地位的老一辈学者，下有在社会各个角落里憋了十

年一拥而入的新学人，他们的存在让老一辈人的噩梦挥之不去，让新生一代莫名其妙。时代可以变，人却变不了。天下大势，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，当年比谁积极，比谁革命，就如同现在比谁有钱，比谁官大。时尚可以变换，主义可以不同，为什么非要置人于死地呢？其实哪一代人没有理想？只不过有的理想尚可用来激励新一代人，有的却注定要随着特定的历史环境的消逝而消失。可叹的，是何止虚掷了十年大好时光，更何止是浪费了一代人辛勤的忙碌啊！

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我爸爸那股读书的劲头。在他无罪扛枷、厄运当头的年月里，他还那么起劲地读书，似乎从来没有动摇过。不要说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与事实大违，那年代，读书得不到奖励不说，反而会招灾惹祸，他却一有机会就读书。抗日战争中有一句很有名的政治动员语：偌大的华北平原，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。可是到了“文革”运动激烈的时候，不要说华北平原，整个中国，怕是也放不下这张书桌。爸爸对读书的偏执近乎宗教信仰，他从工厂回到家，就趴在桌子上写。有趣的是，他就写在那种牛皮纸封面上印着红字“工作日记”的小本子上，有很长时间，我都以为他写的是思想汇报或者劳动锻炼心得。他偶尔拉拉计算尺，用三角板很工整地写一些计算公式，这么陆陆续续记了有十几本。“文革”以后，他出版了新书《工程传热传质学》上册，原来那些“工作日记”，是他为书稿预备的素材。一个人勤奋固然好，如果不仅有勤奋的良好习惯，并且有明确的方向，那就需要一点儿信念了。在大家都不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，没有一点儿“信”，怎么可能持久呢？

有一次我问爸爸，这些政治运动，哪一次最痛苦？他说，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，一定要我和爷爷划清界线，批判他，说他是地主剥削阶级，人都死了，还说他干吗？说爷爷坏，我说不出口。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自杀，他说想过，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，他说再逼我，也就这么多可说的，总不能瞎编吧？把我逼急了，不如就像陈祖东那样，走了算了。陈伯伯是我们的老邻居，1968年秋天清队运动才开始不久，就在圆明园自缢了。

小时候，陈伯伯见我拿着一把木制玩具宝剑，兴致勃勃地楼上楼下跑得欢，就问我愿不愿意跟他演戏？我问什么戏？他说京戏。京戏我不会，他说不会没关系，



1948年，父亲在美国普渡大学与王积涛、陈致忠等合影。

我教你。以前只知道陈伯伯会打太极拳，家里有真的宝剑，没想到他还会唱戏！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全是穿高脚靴，扎靠戴盔，背几面小旗会耍花枪的武生。此后我就一直追着陈伯伯学戏，最后他带我排了一折《三娘教子》，他演老家人薛保，我演顽童倚哥。我们化装演出了两场，一场为我们单元里楼上楼下的邻居，另一场是过年的时候给他的亲戚朋友。不知道陈伯伯后来以生命拒绝揭发交代的人，是不是就坐在这群人里。一个非常和善的老人，想不到竟这么刚烈。如今能有几个清华大学的教授，有耐心和邻居的孩子一同唱戏，并有雅兴在自家客厅里办堂会呢？最难忘的，是陈伯伯那绵绵不绝的长腔和沙哑苍凉的嗓音。

一个人信什么不是强迫出来的，政治学习、思想改造的形式不能说没有效果，但它对人的伤害却是有目共睹的。爸爸相信做学问是要老老实实地做，他的老师是这样做的，世界上其他同道也是这么做的。他信爷爷奶奶是好人，他信的都是值得信的。妈妈去世十多年了，每天早晨爸爸都燃一炷香，上一杯茶在妈妈的像前，因为他心存感激。



1985年，爸爸应邀重访美国时，与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哥哥在普渡合影。

过去经常讲努力改造世界观，因为大家都这么讲，所以也没加思索就跟着讲，其实连世界都不许你见到，观点更是没有，怎么改造？如今我已过知命之年，仍然不敢妄称对这个世界有了多少观点。小时候在工厂和农村劳动，干累了说腰疼，马上会遭到喝斥：你才多大点儿，72岁才长腰眼儿，你敢说腰疼？小孩子没腰！也许是让小时候的教育给搅的，现在如果征求我关于任何事情的意见，我的反应都特别慢，经常顾左右而言他。虽然心里也明白，我的一点破看法不值当去千锤百炼，用不着像外交家那么圆滑，我的看法除了我自己，谁也代表不了。在一个以改造思想

维系的社会里，寻找绝对的道德至高点，成了人们不断追求而又达不到的可怕运动，将人坠入深深的失望与不信之中。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净化我们的灵魂，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也没能把每一个人都变成哲学家，无止境地拷问每一个人的动机耗尽了我们的能量，让我们沉浸在末日的恐慌之中不能自拔。岁月枯荣不再展示生命的喜悦，日月星辰却被赋予了丑恶的政治含义，山河丧失了应有的庄严，草木风景不再有情有义，难道这是现代化的必然代价吗？善良的愿望与丑恶的现实动摇了我对人的信任，破坏了我对国家社会的寄托。为了防止上当，也为了适应严酷的生长环境，我们变得目光短浅，缺少耐心。连我们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在和平的年代，我们一个个要活得如此胆战心惊？

20世纪90年代初我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，也找到了一份说得过去的工作，但爸爸却希望我回国去发展。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觉得他是想儿子和孙子想糊涂了。我爸爸还感慨道：我们过去留学、选专业，都是想中国缺什么？国家需要哪方面的技术和人才？现在的人，都想自己喜欢什么，哪一行出来好挣大钱，时代真是不一样了。难道他就不怕我们出一家子特务吗？不，他不怕，因为他相信，只有国家富强我们个人才能过得好。要说爸爸一肚子学问尽是洋货一点不假，但他的操守，却是地道传统中国文人的，他们一代的坚定与我们一辈的多变，恰成对比。

前些天我打电话给哥哥，问他：爸爸那台美军电子管收音机呢？他说早扔了。我说：呦！怎么扔了，那是文物！

2007年10月26日于无外庐